

1

开国第一桩公案

——梁漱溟与毛泽东交锋

〔题解〕

梁漱溟，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未上大学，却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与李大钊、陈独秀交往颇深。其“乡村建设”理论独树一帜，于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实验。抗战爆发后，应蒋介石之邀成为国民参政会一员，曾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谈。以后为民盟发起人之一，为推动国共合作，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努力颇多。

1953年9月11日，梁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即席发言，次日遭毛泽东不点名批评。梁大出意料，即写信致毛泽东。毛泽东约其谈话，两人不欢而散。梁遂要求政协会议政务会议给予机会辩驳，澄清自己的观点，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回顾与评述〕

“我和毛泽东本来是老朋友”

话题自然从毛泽东的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开始。

梁先生说：“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早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他双唇紧闭，似乎不屑一提。好奇心驱使我们：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他才淡淡地说：

“我和毛泽东本来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要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话匣子打开了，梁先生的回忆把我们引回了遥远的十九世纪末叶。原来他与毛泽东同庚，都生于一八九三年，即清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生肖都属蛇，梁比毛早出生七十天。

早年在北京大学，两人一度同事。一个在图书馆工作，一个在哲学系任教。梁在课前课后总要到图书馆盘桓一会，便自然地相识了。此外，两人之间还有一段历史渊源。

梁氏故家虽然世居广西，咸丰年间，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在湖南定居。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就是生于湘潭，在湖南省的学务处做事，而与杨怀中是莫逆之交。梁焕奎保荐杨怀中留日，还一同东渡日本。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均，则是杨怀中的学生。辛亥革命以后，梁焕奎住在北京缨子胡同梁漱溟家中。杨怀中从长沙到北京，在北大任教，与梁焕奎时相过从。自此便有通家之好，交谊更笃。毛泽东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到北京，最初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怀家中。经杨怀中介而介绍而与梁焕奎相识。后来，毛泽东创议的湖南“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毛泽东深知梁焕奎的籍贯是湘潭，在北大又了解梁漱溟的籍贯是桂林，一家兄弟为何有两个省籍？这个疑团，搁了二十年才算解开。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深重。梁漱溟为了民族救亡大计，先见蒋介石，后访毛泽东。经西安到达延安。毛泽东看见老朋友来临，非常高兴。开口就问：“你究竟是广西人，还是湖南人？”

梁漱溟答以“原籍广西桂林”。毛泽东“刨根寻底”地追问：“那为什么你的老兄，又自称和我同乡呢？”

梁漱溟便把曾祖和曾叔祖或因出仕、或因避乱而离开桂林的原委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请梁漱溟到自己的窑洞里晤谈，有点象“酒逢知己”，在半个月中竟长谈了八次。有两次谈得欲罢不能，竟通宵达旦。当他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请梁漱溟提意见。梁说：“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毛说，不行，这是客套话，非要梁提出批评不可。梁漱溟考虑了一下，便直率地对毛泽东个人提出了希望：“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相约再见。有此渊源，所以毛泽东后来常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当然，在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上，毛梁二人显然不同。但在早期，不少地方却异中有同。例如：写《〈伦理学原理〉批语》时的毛泽东与写《究元决疑论》时的梁漱溟，彼此的思想方法颇为近似。最有趣的是，在“求学”和“办学”等问题上，两人之间，甚至包括胡适之，也有一致的地方。

当时，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与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并驾齐驱。在老北大的同学中，流传着一个“哲学对台”的有趣故事：

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同时同地的楼上楼下，胡适之与梁漱溟分别在两间教室里讲课。胡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学们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之议论梁漱溟道：

“他连电影院都没进过去，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岂不同‘持管’、‘打烛’的笑话一样？”

梁漱溟在回答同学的质疑时，顺口讲了这样一句：

“胡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

这则轶事，见于约四十年前出版的《子曰》丛刊，作者是胡适之的学生。事隔多年，梁老已记不清楚。但他分明记得：毛泽东第

二次到北京，杨怀中先生病故，在法源寺开追悼会。他借宿北长街九十九号一所喇嘛庙里，到北大时还见过几面。当时毛泽东在北京给友人写信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毛泽东还想“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似乎是历史的讽刺，毛泽东“实行共产的生活”而创办“自修大学”，其校名原来出诸胡适之的建议。

当年在“求学”和“办学”问题上，梁漱溟主张“自学”，胡适之“非”难“留学”，毛泽东开办“自修大学”。三者之间，确有不少共同之处。“弹指一挥”，三十年过去，大陆上发动“批判胡适之”和“批判梁漱溟”的两项运动，这是当初的“哲学对台”者所始料不及的。

究竟为何批判梁漱溟？

梁老先生想了一下，微微一笑，说道：“此事说来话长，前因要从一九四六年讲起……”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政协会议虽然还在进行，但“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军事整编”、“施政纲领”、“政府组织”等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已有眉目，差不多可以取得协议，和平建国有望。当天晚上，周恩来到重庆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他说廿七二要飞延安报告，取得中共中央同意后，回来即可签字。他表示：政协取得协议，马上就改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

梁漱溟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身负重任。他已给毛泽东写好一封信，托周恩来带去延安。信内大意是说明：和平有望，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愿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予谅解。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从延安回来，带来毛泽东的复信，对梁想离

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认为：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

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

但梁漱溟很固执，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在政协闭幕那天的宴会上，交给周恩来和张岳军阅看，末后给胡政之在二月一日《大公报》发表。他表示：为了发抒自己的见解，只有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了。

梁漱溟的行动，毛泽东很难谅解。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他躲在虚幻的桃花源——北碚，讲述和写定了《中国文化要义》。许多朋友北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他有点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在此期间，他又写了《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和《敬告中国共产党》，发表在《大公报》上，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以示“中立”和“公正”。——这就是一九五三年受到“批判”的前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各方的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不久，毛泽东也想起了这位老朋友，邀他到北京。

梁漱溟初到北京，毛泽东尚滞留在莫斯科。他对周恩来说：“有些问题还要观察一下。”周恩来表示同意，认为“梁先生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毛泽东从苏联归来，梁漱溟和他重逢于北京火车站。毛泽东见到他，很高兴，当场与梁漱溟约定：找一个时间好好谈谈……。接着，几次邀他去中南海。

有一次傍晚，邀至颐年堂，林伯渠也在座。交谈到晚餐时分，服务员来问：是不是开饭？

毛泽东挥挥手，连说：开饭！开饭！

梁漱溟连说：“我是吃素的，请随便来两样蔬菜吧！”

毛泽东诙谐地说：不！不是两样！统统要素菜，我们今天吃饭是“统一战线”、素食主义……。

毛泽东请梁漱溟在新政府中任职，梁漱溟固执己见，说“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而敬辞不受。

后来，毛泽东批评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即肇源于此。

一九五一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梁漱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言下之意，是说知识分子入了党、农民入了党，是否也存在思想改造的问题。——周恩来表示，“梁漱溟先生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许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也要改造。

两年后，讨论“总路线”，请了一百多人参加。梁漱溟和张治中、侯德榜一齐坐在长沙发上。梁漱溟联系自己的一些见闻，提意见，要求对农民行仁政。他说：“希望共产党进了城市不要忘掉农民。有些农民的干部不好，把持乡村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搞不好，肚子吃不饱，农民没有信心，大批涌进城市当小工，每天可挣一元钱。他们在北京露宿，街头煮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把他们遣送回去，他们明天又来。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的农会却靠不住。有人说‘工农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希望对农民行仁政，要体恤农民……。”

讨论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来了，大家请他讲话。讲话中间，毛泽东不指名的批了一下梁漱溟。大意是：有人提出行仁政，讲这个

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至于说工农之间有九天九地之差，是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

三十年后，梁漱溟先生说：“我感到很遗憾。当时如果听过算了，不去计较，也没有点我的名，就没有事了。我不服，也沉不住气，就写信给他。信中提出：你所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

次日，怀仁堂有京剧招待会，演出《梁红玉抗金兵》。周恩来请梁漱溟观剧，安排他与毛泽东坐得比较近。对于梁的信，毛泽东一字不提。梁漱溟又忍不住了，戏也看不下，和毛泽东解释，请他收回这个话。毛泽东生气了，说不收回。梁漱溟还要提意见，周恩来连忙相劝，要大家先看戏。

过了几天，在一次正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说：“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批判了梁漱溟。这就是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份量很重，令人震惊。当场，陈铭枢就问道：“梁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表示：是人民内部矛盾。接着，学术界对梁漱溟展开全面批判。不过，当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访华时，周恩来仍邀请梁漱溟参加宴会。

此事距今已三十三年。梁漱溟先生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象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由重庆抵北京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忆建国后毛泽东同我的若干次谈话——赴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参观考察——参加四川合川县土地改革——毛泽东赞邓小平政

治、军事都是一把好手——略谈解放初期我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

问：梁先生曾提到，在建国初期（指1953年9月之前），您和章士钊先生有幸成为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客，经常应邀去中南海与毛主席长谈，您能否叙述在这一时期同毛泽东主席的交往中，有哪些谈话印象较深？

答：我于1950年1月中旬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沿途由四川省委统战部派专人护送我北上，在武汉还受到当时湖北省任职后调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的张执一盛情招待。抵京后正值毛主席和周总理皆在莫斯科。3月10日主席和总理返回北京，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的，统战部把我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并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11日公宴，我又见到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我同毛主席的交往，在前边提到的，有1938年初和1946年初的两度赴延安。这里我还有更早的一次需要补充。这是我1938年初在延安同主席见面时，由他提起而使我忆及的距当时约二十年的往事。主席说，梁先生，我在民国7年（1918年）北京大学就见过您，那时您是老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还记得吧？主席的记忆力使我吃惊，他的话自然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同主席同岁，稍长于他。杨怀中先生比我们年长。在民国6年我进北京大学教书之前，因我的一位本家兄长梁焕奎（我原名梁焕鼎）与杨先生相交颇深，他常引杨先生到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我家中聚谈，我也因此与杨先生相识。更由于杨先生是搞哲学的，而我则正在自学佛学与印度哲学，谈起来便有话头，常常向他讨教。民国6年（1917年）我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样我就同杨先生成了同事，我们的交往

就更多了。

杨怀中先生当时居家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是我常去的地方。民国7年，毛泽东自湖南来北京。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是杨怀中先生所喜爱的学生，经杨向蔡校长推荐，给毛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元大洋的小差事，平时在杨家住宿。因住的正好是大门一侧的南房，所以常常为来客开大门。经毛本人对我在1938年的揭示，我也确切地记得当时我去杨家，是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但身材比我高许多的湖南青年常开门迎我或送我，杨先生本人也向我介绍过，但我记忆不深。不久杨怀中先生病故，因家境萧条，办丧事有困难，还是由蔡校长出面，由大家资助的，我是资助者之一。具体为杨办丧事，还是毛泽东。至于毛何时与杨怀中之女杨开慧结婚，当时我却没有印象。

我插补这段旧事，意在我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远在彼此年轻的年代。再加上后来在延安时期的两次见面，毛成为伟人后又厚待于我，我便在思想上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老朋友了。这一点与1953年发生的顶撞毛主席一事是有关连的。

现在的话头再回到1950年3月12日晚间，毛主席第一次约我谈话。大概是下午将近五点钟的样子，毛主席派来的汽车来到我当时的住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我进了颐年堂的第一道门，毛主席已在里边迎我了。这次谈话有林伯渠在座，他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也是1938年初我去延安经西安时认识，并在后来重庆旧政协会议上交往多次的熟人。但此次谈话，林老只是听，几乎没有插话。

毛主席这次谈话，一开头是寒暄，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转入正题，毛主席即问我对国事有何意见？我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接着毛主席就对我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可难住了我，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

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考虑了片刻，答复说，主席，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我的答复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外，他显露出一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很快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到了开饭时间，主席传话开晚饭，我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主席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吃饭时多了一个江青，但我们只是点点头，没有谈话。

问：梁先生当时为什么说，把自己摆在政府的外边呢？

答：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简要地说，我当时思想状况，仍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如果我自身参加了新政府，就失去为各方说话的身份了。在国民党时代，远在我对政局失望之前，就有人请我参加政府，我也没有接受。我总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做官的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才干。我虽然到了北京，加入了新的阵营，但还想站在边上看看，旁观者清，我的作用也许正在这里。

问：这次毛主席约您谈话，除了请您加入政府工作外，还有别的内容吗？

答：有。主席还告我，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并说具体行程他会交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

4月间，我带来了随员孟宪光、黄良庸、李澂三人从北京出发，先到河南省，后到山东省、平原省农村参观访问。在河南，接待我的主要负责人员吴芝圃，当年是新四军彭雪枫将军的副手，我们在席间谈起抗战初期我巡视敌后与他见面的往事，十分高兴。他让一位姓贾的副主席（是位老先生）陪同我到郑州以北的农村参观。在山东，谭启龙接待了我，我主要看了邹平。

在东北的时间最长，最远到了齐齐哈尔、漠河，主要看工业。一开头，副主席林枫招待我，吃饭时他说，高岗主席这几天特别忙，抽不出时间陪您，他让我替他向您问候。我说不必劳动他了，也不必麻烦您了，我只是到处看看，在河南、山东我看了农村，到东北则想看看工业。他说很好，可以安排。随

后叫周秋野全程陪同我。等我参观结束返回沈阳，准备回北京时，周秋野突然告诉我，说高岗主席看我来了。他引我到宾馆会客厅，高岗已在那里了。高出身陕北，是颇有名望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过去我没有见过他。他身材高大，满脸麻子，说话时眼珠不断往上翻，常常只见白眼珠，而不见黑眼珠。他先问我在东北看了哪些地方，我大体作了回答。随后他说，梁先生，对东北的工作，欢迎您提意见啊！我说东北不错，工业基础要比山东、河南强多了。但我看到工人居住条件差，房子太紧、太挤，几代人住一个炕，且十分分散。旧中国无人过问这种事，现在刚解放也还顾不上，但迟早总要着手进行的。我建议政府应通盘考虑，选择适当的地区搞居民点，有计划地建设。这里不仅有新的住房，还应考虑到街道、交通，以至建一座大会堂，职工开会、娱乐都在这里。总之要有一套设施，作长远的考虑和打算。农民的建房虽然是个入出资，因地制宜，但东北地大，又是平原，政府亦有条件引导他们相对集中一些，农民居住分散也不好，不能适应今后生产的发展。高岗很赞赏我的建议，并说欢迎我今后常来东北看看，多提意见。

问：梁先生，在参观访问之后，毛主席又约见您了吧？

答：是的。从一九五〇年四月至九月中旬，我都在外地参观访问。九月二十三日晚，主席找我谈话，但那天我另有约请，是匆匆吃过晚饭才去的。我到主席住处，他即让人上菜吃饭，而且也准备了素食。我十分歉意地说，我因有约请，已吃过晚饭了。于是江青给我送来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我一面吃，一面想，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这个时候，但没有发问。这时主席在饭桌上问江青，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只要决心大，有毅力，没有达不到的目的、办不成的事。主席讲这些，都没有避开我。饭后主席询问我参观访问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谈完后，又对我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但我表示，今年出去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东北、华北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这一次我又没有接受主席的意见，但不象上次那样，主席没有显露出不高兴，他笑

着摆手说，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这次谈话的末尾，主席对我说，听说你抵京后一直未有合适的住处，我已让人安排接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在家听候安排吧。

关于我个人的住房及生活，主席曾问起过，但我并未细说，总是表示自己并无困难。我当时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处。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派车接我去颐和园，住进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一直住了两年多，直至后来搬至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为止。住进颐和园之事，足见主席对党外人士生活之关心，照顾之周到。

问：梁先生，听说您在建国初期还曾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您能否谈谈参加土地改革的见闻和感想吗？

答：1951年春，中央有组织赴西南土改团之举。我省悟主席头年要我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在要我看看土改，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我所在的土改分团由章乃器任团长，有二十多人，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近四个月。刚到重庆，就听邓小平做报告，介绍情况，那时刘（伯承）、邓主管西南和四川。结束时做总结，邓又参加会议，讲了话。邓小平年轻、能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个团，在川东合川县。因为大多是年岁稍长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我去的黄良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宿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等，都参加了。同我们一起的还有于学忠，他也是一块从北京来的。

我于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间毛主席就约我去谈话了。他派车到颐和园把我接到中南海，还是在老地方。在我进门时，章乃器刚刚告退，他主要也是来报告到西南参加土改情况的。毛主席对我说，土改团的情况，章

乃器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主席仍陪我吃素，只有我们两人，不喝酒水，很快就吃完了饭。主席很能吃辣椒，我则不敢多尝。饭后毛主席问我，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致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第二点我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我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形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说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政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我特别讲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我还举了解决四川的袍哥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大，影响很快。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毛主席听着我的话，竟笑出声来，然后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我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久大区撤销，毛主席调邓小平到中央，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走上总书记的重要岗位。即便在“文革”中毛主席仍不时说邓“人才难得”，因而几起几落，还能留在党内，以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掌航向，使国家走上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问：梁先生还能记得在1953年之前，毛主席召您谈话而至今仍留有印象

的其他一些较重要的内容吗？

答：有不少谈话印象浅，记不得了。还记得一次，是1952年8月7日，那天是下午，从一点多谈到三点多。这几年毛主席找我单独谈话，都在晚上，而这次是例外。

在这次谈话中，我提出到苏联做学术研究的要求。当时苏联的学说在中国很时行，我最感兴趣的是巴甫洛夫学说，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观察学说，我以为虽不是心理学，但近似心理学，而我历来是对心理学很感兴趣的。当然，我对巴甫洛夫学说，不过是看过几篇文章、几本书而已，只够一知半解的程度。我的要求受到主席的劝阻。他摇摇头说，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主席强调说，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我听了后说可以考虑。8月9日徐冰即传达主席之意，问我何时出发，先去哪里，同行何人。我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这一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我当时依然我行我素。我不尊重主席的安排，不理解主席的话，并不止这一次。

问：梁先生，类似的情况，您能记得的还有什么？

答：挑印象较深的，谈三件事，都发生在1950年。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从1953年以后，我改在观礼台观礼，从此没有上天安门城楼），主席、总理都同我们在一起。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向毛主席赠旗，旗上写着一行字：“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这话可能代表若干人的意思，但不代表我，我觉得对主席的尊敬亦不必说这种过头的话，因此我当时也想到，这话也未必能代表所有的人。我当时没有提出也不好提出不同意见，但如事先让大家讨论锦旗上写什么合适，我一定会发表意见的。我的这些想法直至1958年向党交心时，才如实地讲了出

来。

第二件事，是这一年我参加或列席了政协、政府的若干会议，我一直一言不发。时间久了，大家注意了这一点。因为我是新近到北京的，一般都要说话，表态，我却默不作声。最先是邵力子、王绍鏊、雷洁琼、朱蕴山、罗叔章等老朋友关心我，先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希望我讲讲，我无言以答。我当时心里是很不赞成在大小会议上大家都一味讲颂扬的话，这没有意思，对作为领导党的中共并没有好处。既然开会，就应该提出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大家共同讨论，互相磋商。要我只讲颂扬的话，不如不说。不久，徐冰、齐燕铭两位中共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什么意见尽管发表。徐当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齐是政务院副秘书长，抗战时期在重庆我们就认识，可算是老朋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工工整整地写了一纸几百个字的发言稿，在怀仁堂的一次大会上讲了几分钟的话，中心意思是，开会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认识，解决各种问题，因此必须讲各方面的意见，赞同的，不同的，反对的都可以讲，大家互相交换，共同讨论。这样的会议才能更有收益。言外之意，是不能一味讲歌颂共产党的话，对会议的开会有所批评，但没有直接说。我发言后从台上走下来，坐在第一排的薄一波同志还同我握手，说梁先生，你的意见很好。徐冰、齐燕铭二位让我谈话，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呢？他们没有说，但当时我估计有这个可能。我的话合不合毛主席的意，我也没有把握。

这三件事发生在这年10月25日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前夕。9月23日毛主席约见我，我谈到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主席讲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的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但我深以出兵为疑。我说新中国刚刚建立，卷进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样呢？在这次谈话后的几天，政协王伯平奉命到颐和园找我，说领导上让我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个组织里担任一个负责的职务，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表态，只说待我进城再说。次日我即进城找林老（伯渠），正巧他陪宋庆龄去东北参观了，但秘书说这两天即返京。果然第二天林老就约我吃饭，征求我对出兵朝鲜的意见。林老说，中共和政府考虑再三，作出决策，不出兵不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总动员。我说对出兵朝鲜我是有疑虑的，日

前已向主席陈述过理由，但现在此事既已决定，我也自当一致拥护无二意。至于出任“和大”职务之事，林老没有谈，我也没有提，就拖了下来，实际上是我自己不想就任。这桩事主席虽未直接同我谈过，但我估计他是知道的，也可能不满意我的行为。

问：这几件事，说明梁先生刚到北京的头一年，的确在自己的言行上依然不轻易苟同于人。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梁先生到各地参观访问，还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又常常直接受到毛主席的教诲，请问如追溯到解放前梁先生对中国前途问题的主张，不知这时有何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答：有的。我于1951年10月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长文，题目就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我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

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是“打破记录”了。因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积几十年如此。所以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思想发生变化，其原因除毛主席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之外，最有力的外因有三：一是1950年4月至9月，在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的参观考察；二是1951年5月至8月，在川东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地改革；三是两年来我结合社会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这三个外因，促使了我的思想发生转变。

那么，我的思想变化最大之点在哪一点上呢？最简要地说，是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

几十年来，我根据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不鲜明，阶级斗争便不突出，其最高形式之武装革命（即暴力斗争）则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我在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中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不须作任何暴力斗争，二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功夫远在暴力斗争之外，三是暴力斗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四是暴力斗争势必迟延中国问题之解决。

显然，我过去所持的理论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大相径庭的。而在我，却一直盼望中共能转变。所以一旦看见中共倡导抗战而放弃国内斗争（我则笼统以为放弃阶级斗争）；便只身奔赴延安，而后奔走团结（抗战中），争取和平（抗战胜利后），前后八年不敢惜力；而一待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此谓行动上虽与中共有配合，但在理论主张上又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

为什么自己多年来如此自信呢？一方面虽亦有某些方面不为无见，一方面却正是主观上有所蔽，遂于国际国内的某些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自己蒙蔽自己的状态，直到建国后到北京才逐渐发觉并有所省悟。

1950年春夏之间，我访问考察了山东老解放区，搞清了当地从抗日伪到抗蒋美十多年的斗争经过，立即恍然于自己一向错误之所在。斗争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寇入侵，国军撤退，各地成立抗敌组织，社会各阶层一般都参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及至日寇大事扫荡，抗敌进入艰苦阶段，许多地区不能保持。在敌伪残杀威胁和利诱之下，城镇中地主富绅率先投降，凡是那些“有身家者”亦皆所不免。其始终团结在八路军、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而不散者，多是贫苦农民。阶级成分至此乃大见区别，胜利之前开始反攻，至胜利之后又收复了许多地方。在“反汉奸”运动中，农民清算斗争了许多地主富农，阶级对立十分尖锐。不久，蒋军又进攻解放区并占领了一些地方，地富便进行“反清算”，杀了许多农民。阶级相仇，又自加深。而后蒋军被解放军打败，解放区的农民又起来斗地富，直至土地改革结束，最后消灭了地富阶级。

这些事实告诉了我，北方农村如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其阶级对立虽不如人家那么鲜明、尖锐，但既有贫富之别，到一定时期便可能裂为两边而相斗争。我过去只见其静态，而于这种发展的可能却未注意估计到，这是第